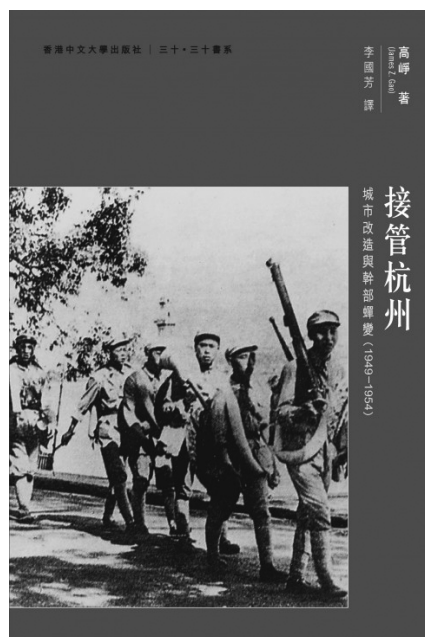


# 政治史與文化研究的對話

## ——評高崢《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

●董國強、顧荻飛、徐垚

1949年前後中共接管和改造城市，並非一個全新的史學研究議題。「接管準備—政權建設—經濟恢復—社會控制—接管經驗」，成為黨史類著述固定的論述框架與書寫範式。



高崢著，李國芳譯：《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

在「解放戰爭」（1946年6月至1949年9月）後期，中國共產黨開始放棄長期堅持的「農村包圍城市」

革命道路，嘗試建立以城市為中心的政權體系。以1949年10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為標誌，中共在短短幾年時間裏就在全國城鄉建立起有效的統治。回顧這段歷史，必然涉及以下問題：中共政權的建立與鞏固，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怎樣的意義？從以農村工作為中心到以城市工作為中心，中共幹部經歷了怎樣的角色轉換？在接管城市和改造城市的過程中，中共政權面臨哪些問題，又採取了哪些具體措施來穩固政權？

1949年前後中共接管和改造城市，並非一個全新的史學研究議題。自1950年代以來，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也為了彰顯中共政權的政治合法性，中共各級黨史研究機構陸續編撰出版了大量相關論著，其中卷冊最多、影響最大的無疑要數1990年代後期由全國各省市黨史研究室編撰、由各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叢書。這類著述遵循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前後提出的「中共

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研究的指導思想，以各級黨政領導機構為考察和論述主體，以「文山會海」的方式展示「重大方針政策」的決策和實施過程，以及隨之而來的「偉大成就」。「接管準備—政權建設—經濟恢復—社會控制—接管經驗」，成為固定的論述框架與書寫範式。顯而易見，這類著述其實是各級黨委施政方針報告和經驗總結材料的擴充版，集中反映了執政黨的主觀認知與現實訴求。而近十多年來出現的一批以此為題的高校碩博士論文，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基本格局和學術品味都與上述黨史類著述大同小異。目前國內學者的相關著述中，只有楊奎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和張濟順的《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在敘述重點和評價體系方面別具一格<sup>①</sup>。

正因為國內黨史學界普遍存在的同質化、概念化、模式化的論述，我們在閱讀《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引用只註頁碼）時感受到強烈的思想衝擊。本書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19年出版的譯著，其英文原著於2004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推出。作者高崢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來赴美國留學，現任馬里蘭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該書英文版面世時，得到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等人的高度評價（〈中文版序〉，頁xxiii）。國內的中共黨史研究權威楊奎松也對該

書讚譽有加，促成了中文版的翻譯和出版（〈致謝〉，頁xxii）。

## 一 問題意識和研究路徑

本書能夠得到廣泛讚譽，首先與作者獨特的問題意識和中心議題有關。在他看來，長期以來中文文獻在很大程度上運用黨史研究的方法，強調軍事勝利，並把中共的組織成就與經濟成就理想化，忽略了1950年代的社會緊張與危機。這樣的認知在後毛澤東時代並未改變（〈序言〉，頁xxx），並延續至今。而西方學界的相關研究則在1990年代經歷了從「革命範式」向「現代化範式」的嬗變——從主要關注中共自身的政治活動及其取得勝利的的原因，轉向更多地關注中共建政初期的商業、消費、娛樂、城市化、印刷文化、現代設施、婦女、新興職業發展等專題。基於上述的學術史發展，作者為本書確定的研究思路，是將政治史、社會史與文化研究結合起來（頁xxv-xxvi）。他強調「共產黨接管城市不僅是政治事件，還是一個文化事件」（頁xxiii），試圖借助杭州個案研究，揭示中共幹部與普通百姓通過政治機構進行的互動怎樣演化為一個文化進程，並體現在形式多樣的儀式之中，而這又形塑着公眾對革命政治成果的反應（頁xxx）。

由於接管杭州的中共幹部主要是來自山東革命根據地的農民，因此作者十分關注農民幹部對「現代性」、「傳統」和「革命」的看法，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行為。他認為中

作者為本書確定的研究思路，是將政治史、社會史與文化研究結合起來，試圖借助杭州個案研究，揭示中共幹部與普通百姓通過政治機構進行的互動怎樣演化為一個文化進程。

本書有意識地突出了社會史和文化史方面的內容，政治史方面的敘述在大多數情況下僅意在說明歷史背景。作者着力在書中各章節呈現的主題，是兩種異質文化的相遇、衝突、互動、趨同。

共幹部進城伊始，就面臨着重建政權、恢復經濟的重任，同時也馬上感受到異質文化的衝擊。因此，需要深入探討的具體問題包括：文化差異是否南下幹部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南下幹部是否曾經從文化入手來展開對城市社會的革命化改造？中共是否也曾認識到傳統文化對個人和城市的價值，從而刻意地保留、保護一些傳統文化？城市文化在被改造的同時，是否也影響和改造了中共幹部——即改造者是否也會被改造（頁 xxiv）？

作者明確地意識到，要回答這些問題和其他許多相關問題，不僅需要科學理論的討論，也需要歷史的實證研究。首先，他在杭州市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山東省幾家檔案館、浙江省婦聯資料室等處收集了大量檔案資料。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檔案資料中，他比較看重的是各級黨組織對工廠、學校、社團、職業組織等基層單位情況的調查報告（而非宣傳總結資料），以及能夠反映領導機關決策過程的文件，這些文件包含了討論計劃時的各種不同意見（頁 xxxiv-xxxv）。其次，作者對三十多位年過八旬、見證過接管的親歷者進行了訪談。這些訪談對象包括農民幹部和城市居民，訪談內容涉及黨務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提供與官方的黨史敘事截然不同的版本。再次，作者系統爬梳了領袖人物傳記和年譜資料、山東和浙江兩地的多種報刊資料、地方志資料、地方文史資料以及各類小人物的回憶錄資料等。在充分佔有系統性資料的基礎上，作者打撈出大量珍貴的、多

元化的歷史記憶，構成一個與眾不同、特色鮮明的歷史敘事，很好地實現了其研究設計的初衷。

## 二 主要內容概述

本書正文共分為八章。首先，從整體編排來看，各章的敘述內容與一般黨史類著述重合度很高，人們耳熟能詳的抗美援朝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運動、「五反」運動、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運動、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等都有涉及<sup>②</sup>。然而，作者並非機械地按照這些運動的先後順序展開歷時性敘述，而是有着獨特的論述框架和論述重點。其次，檔案資料雖然構成本書的主要信息來源，但書中的敘述內容並非冗長、枯燥、沉悶的文山會海和統計數據堆砌，而是對檔案資料內容進行了濃縮提煉，形成較為簡潔流暢的歷史敘事。而取材於文史資料、回憶錄和口述歷史的一些生動的個人小故事穿插其間，不但增強了本書的可讀性，同時也使一些概念化和結構性的分析變得易於理解。

如果按照約定俗成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概念分類，本書有意識地突出了社會史和文化史方面的內容，政治史方面的敘述在大多數情況下僅意在說明歷史背景。作者着力在書中各章節呈現的主題，是兩種異質文化的相遇、衝突、互動、趨同。

第一章「接管前夜」側重概述了魯中南和杭州兩地的自然環境、歷史沿革和經濟狀況，以及南下幹

部與杭州市民兩大群體的思想觀念差異。作者提到，魯中南雖然是孔孟故鄉，中國文化傳統深厚，但自然稟賦較差，經濟結構單一，百姓飽受災害和戰亂之苦，歷史上就有農民起義的傳統，近代以後又成為中共革命的溫牀。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各種軍事力量在當地頻繁交戰，基層政權多次易手，報復性殺戮層出不窮，導致當地階級關係不斷惡化。上述因素鑄就了當地中共幹部的精神特質——他們大多是土生土長的農民，苦大仇深，鬥爭性強，但文化程度低，鄉土觀念重，對城市知之甚少，甚至抱有一種天然的抗拒心理。而杭州處於長江下游丘陵水網地帶，自古以來經濟發達，百姓生活富裕，階級關係融洽。由於當地民眾樂於接受任何強勢政權的統治，所以杭州城在歷朝歷代很少遭受戰火塗炭，是一座供文人雅士、高官顯貴、普通百姓遊樂玩耍的歷史文化名城。因此，杭州市民大多性格溫和，小富即安，貪圖享樂，同時崇尚城市文明，歧視「鄉下人」。上述對比凸顯了「革命文化」與「不革命文化」、「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齊魯文化」與「江南文化」、「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二元對立，為後續論述作出了必要鋪墊。

第二章「幹部培訓」聚焦於南下幹部的抽調與培訓。作者提到，基於「外行領導內行」的執政理念，南下幹部在台兒莊和鹽城整編整訓期間，尤其注重政治領導能力，如控制秩序、制訂計劃、鼓動群眾、宣傳政策等。這無疑強化了南下幹部固有的政治精英意識，為接管杭州以後中共幹部與城市中的文化精

英和經濟精英之間的文化觀念衝突埋下伏筆。此外，作者將南下幹部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農民幹部。他們文化程度不高，但久經考驗，對黨忠誠，深得上級信任，構成南下幹部的主體。第二類是在解放區城市中新招募的學生積極份子和其他進步青年。他們通常充滿革命熱情和理想，但缺乏實際鬥爭經驗，對黨的組織紀律觀念較為淡薄。在黨組織看來，他們也是需要加以教育改造的對象。第三類是以譚震林、譚啟龍、楊思一為首的「返鄉幹部」。他們要麼出生於浙江，要麼曾在當地為黨工作，後因種種原因北撤到山東根據地。他們大多有較長黨齡和較高領導職務，後來成為杭州市黨政領導班子成員。這樣的細分凸顯了中共幹部隊伍內部的文化觀念差異，為未來的黨內鬥爭埋下伏筆。

第三章「初試牛刀」講述中共軍隊和南下幹部剛進入杭州時的情況。從書中敘述看，中共在接管杭州初期推出的政策和措施，與其他地方大同小異。具體工作包括成立過渡性權力機構，接管國民黨黨政機關和大型工礦企業，搜捕國民黨殘餘勢力和土匪，接管金融部門和經濟管理部門，調處勞資關係，恢復正常的工商業經營活動，控制物價、穩定貨幣、保證市場供應，等等。但作者的創新努力也顯而易見：其一是依據多元史料和典型案例，較為詳細地論述了杭州市民和中共幹部彼此的初步印象，突破了以征服者為中心的歷史敘事框架，使得被征服者不再是微不足道、可有可無的陪襯，進一步彰顯「文化衝突論」的主題。其二是通過對各

作者概述了南下幹部與杭州市民兩大群體的思想觀念差異，凸顯了「革命文化」與「不革命文化」、「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齊魯文化」與「江南文化」、「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二元對立。

杭州城內的局勢初步穩定後，地方當局在實際工作中，不得不對強調「階級鬥爭」的理論教條和外地經驗持審慎態度，將維持社會穩定作為優先考量。這反映了中共革命理念對城市現實環境的妥協。

級各類「學習班」的敘述、對街道景觀和市民服飾變化的描述，以及對革命歌詠和普通話風行的描述，具體展示了「革命」對杭州市民及城市文化的影響，進一步彰顯了本書的社會史和文化研究特色。

第四章「退一步，進兩步」講述杭州城內的局勢初步穩定後，地方當局面臨的新問題及其應對辦法。第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是南下幹部中滋生的特權腐敗苗頭。南下幹部接管杭州以後，市領導搬進了西湖岸邊的別墅，區領導住進了鬧市區的豪宅，汽車、特供食品、服務員以及其他特權均為高級領導所獨享，官場上的等級禮儀也應運而生。而在中下層幹部中，追逐名利、利用權力貪污、享受奢侈生活等現象較為普遍。按照作者的觀點，這反映了城市文化對南下幹部的侵蝕。為此，中共在黨員幹部中大張旗鼓地開展「不忘本」教育，同時組織大批幹部下鄉參加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在中共高層看來，只有讓南下幹部重新體驗艱苦戰爭和參加農業勞動，才能恢復他們與農民群眾的聯繫，保住其農民本色。第二個較為突出的問題是中央制訂的各項政策並不完全適應當地的實際情況。例如，南下幹部在杭州郊區開展土改工作時，發現當地極少有北方農村中常見的大地主，土地所有權大多分散在工商業者和自由職業者手中。與此同時，當地農民的生計也很少依賴土地勞作，而是會兼營手工紡織業、運輸業和小雜貨店。再如，南下幹部在嘗試培養工人積極份子、解散受國民黨支持或被青幫控制的「黃色工會」，以及成立服從中共領導的新

工會的過程中，發現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較高的技術工人根本不關心政治，而一些政治上表現積極的青年工人又與各種幫會和國民黨、三青團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地方當局在實際工作中，不得不對強調「階級鬥爭」的理論教條和外地經驗持審慎態度，將維持社會穩定作為優先考量。在作者看來，這反映了中共革命理念對城市現實環境的妥協。

第五章「朝鮮戰爭時的杭州」講述中共政權如何利用戰爭動員的契機，以一種激進姿態開展抗美援朝、鎮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不過與其他相關論著不同，本章更加側重這些運動在文化方面的具體表現。朝鮮戰爭爆發後，地方當局全面接管了接受美方資助的教堂、學校、文化機構和社會公益團體，迫使外國醫師、教師和傳教士離華，並通過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實現對教會及教徒的管控。與此同時，廣泛開展反美愛國宣傳運動，肅清美國文化對杭州市民，尤其是那些倡導「第三條道路」的民主人士、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的影響。一些高層統戰對象如郭沫若、史良、馬寅初等人，因在公開場合高調反美而受到官媒追捧，堅持親美立場的大學教授束星北和談家楨等人則作為反面典型受到批判，其結果是舊知識精英群體的政治邊緣化。此外，本章還論述了社區管理模式的變更（廢除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員會和居民小組，採取戶口登記、「特口管制」等措施），如何對傳統的家庭觀念和鄰里觀念形成衝擊。

第六章「實力的較量」主要涉及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

和1953年的「新三反」運動。從作者的敘述看，前兩場運動的發展過程及其引發的社會震動，與其他城市大同小異。不過下述內容在現有論著中大多語焉不詳：絕大多數被打成「老虎」的黨員幹部，以及「不法資本家」中一些高層統戰對象，到運動後期都在當局的刻意保護下得到解脫。這表明「團結多數，孤立少數」是中共一貫的政治策略。通過聲勢浩大的揭發批判運動，對貪腐幹部和不法資本家形成有效震懾，同時採用法外施恩的方式讓他們感激涕零，增強其依附意識，無疑有助於鞏固中共政權。然而這樣的政治策略不但與中共公開倡導的革命理念相互抵牾，而且有違現代法治原則，必然導致政治過程中的「機會主義」傾向。而本章關於「新三反」運動的論述，則使人聯想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sup>③</sup>。「新三反」運動的初衷是號召全黨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做堅決鬥爭，其結果卻變成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無情鎮壓。一些富革命理想和激情的知識份子幹部和青年幹部，或因為具體工作中的意見分歧，或因為批評領導幹部的缺點錯誤，而遭到打擊和清洗。

第七章「婦女幹部」探討南下幹部的性別、婚姻、家庭觀念，凸顯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男尊女卑」觀念的深刻影響。這個議題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很有價值，作者的相關論述——諸如女性積極投身中共革命的多重動因，婦女幹部在革命工作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中共處理革命隊伍中兩性關係的原則及其實踐，新《婚姻法》頒布與南下幹部的離婚、再婚問題，遭到南下

幹部遺棄的農村女配偶的生活安置問題，農村婦女幹部和城市婦女幹部的群體性差異，中共建政後男女幹部配偶之間的職務差別、待遇差別及其對家庭關係的影響，等等——也較為詳實、精彩，但有些內容似乎追溯過遠且略顯龐雜，與「接管杭州」的主題關聯性不大。畢竟，婦女幹部從來不是中共黨內的主導力量，也未在接管杭州的工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第八章「東方日內瓦」討論杭州的城市發展定位。中共接管其他城市後，都積極致力於將它們從「消費型城市」改造成「生產型城市」，尤其注重發展地方工業<sup>④</sup>。杭州的情況與此不同。1953年蘇聯專家率先提議，要利用杭州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特點，大力發展當地的娛樂業、旅遊業、文化產業和國際會議設施，將其打造成「東方日內瓦」。這個提議立即遭到南下幹部的反對。最後毛澤東乾綱獨斷，接受了蘇聯專家的提議。他認為「在國家政治博弈中，城市的自然風光及其文化設施就是資本，杭州必將，也應該在國家經濟建設中及共產主義政治舞台上扮演特殊的角色」（頁210）。不過，「東方日內瓦」的提法從未出現在中共文件和宣傳資料中，因為這個西方化概念易於產生資本主義的聯想，與中共倡導的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抵牾。杭州隨後的發展反映了中共革命觀念與杭州文化傳統的相互融合。例如，出於地方經濟和宗教政策方面的考量，當地的佛教寺院大多保留下來，但僧人必須改變生活方式，接受思想改造；越劇得到中共幹部的欣賞和扶持，成為杭州乃

本書探討南下幹部的性別、婚姻、家庭觀念，凸顯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男尊女卑」觀念的深刻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很有價值，作者的相關論述詳實、精彩，但有些內容似乎追溯過遠且略顯龐雜，與「接管杭州」的主題關聯性不大。

在中共接管城市的過程中，國家強制是基礎，文化批判是表現，政治控制是目的。然而，來自農村的革命者要戰勝城市居民的文化偏見並非易事。因此，中國政治社會中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三種特性：機會主義、政治儀式、身份認同塑造。

至中國在國際上的文化名片，但許多傳統劇目都被嵌入了革命主題，演員也被要求參加政治學習。然而，與第四和第六章提到的中共幹部特權腐敗問題相呼應，本章凸顯了「改造者如何被改造」的主題：兩大著名私家園林建築劉莊和汪莊成為杭州的「紫禁城」，專供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休閒娛樂，普通民眾只能望而卻步；而且當地文藝團體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為高級幹部提供舞伴。難怪毛澤東稱杭州為「第三故鄉」，常常在此樂不思蜀。

以上對各章內容的概述難免掛一漏萬，但相信有助於讀者了解本書的內容和旨趣。在第九章「結論」部分，作者就全書內容作出了進一步的理論闡釋。他指出，按照毛澤東的政治運動模式，在中共接管城市的過程中，國家強制是基礎，文化批判是表現，政治控制是目的。然而，來自農村的革命者要戰勝城市居民的文化偏見，並非易事。因此，中國政治社會中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三種特性：機會主義、政治儀式、身份認同塑造（頁250）。

作者進而指出，由於受到各種現實因素的制約，南下幹部在接管杭州初期不得不對一些激進的革命綱領作出策略性調整，甚至會利用舊社會的某些遺產來建立新秩序。這反映了中共政治過程中的機會主義傾向。結合具體情況分析，這種機會主義傾向有時反映了一種經驗理性，即中共高層容許並鼓勵中下層幹部根據其所處的實際環境，創造性地詮釋和執行黨的基本方針和政策，並在遭遇阻礙時作出必要讓步或者採取迂迴戰術。然而，這種機會主義也有着嚴重缺陷——

這其實意味着，中共幹部如何解釋政策取決於他們的需求、能力以及其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謀劃（頁240）。由此造成各項政策前後不一，甚至自相矛盾，必然有損於中共的政治信譽。這還意味着，當某些政策不得民心時，中共高層可以通過責難中下層幹部來維護自己的英明形象。這必然引發中下層幹部的不滿，以至影響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執行力。

作者還指出，當時的各種「會議」作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儀式，同時具有禮儀性和工具性，對於中共新政權的穩固至關重要：「在中共的政治進程中，不但對散布共產黨的價值觀念，而且對肅清不受歡迎元素，會議屢試不爽。」（頁245）通過政治儀式來彰顯新政權的合法性，是古今中外歷史上一種屢見不鮮的現象。但中共的獨特之處在於通過會議體系的制度化，將政治儀式植入市民日常生活。作者還具體闡釋了會議在中共政治中的工具性作用：第一，賦予新政治秩序以合法性；第二，有益於中共形成對真理的壟斷和造就新的精英；第三，具有動員民眾的功能；第四，通過設定各種會議的參會者資格，可以明示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地位，達到區隔民眾、分而治之的目的（頁243-45）。

除了明智地運用機會主義策略和政治儀式外，南下幹部還擁有「後革命社會領導者」的優勢。在新的地理文化空間中，南下幹部力爭把自己樹立為無可置疑的政治精英。這樣他們就具有了雙重身份認同——既是「農民革命者」，又是「杭州同志」（實際上是杭州城裏的

新權貴)。不過作者也提到，南下幹部雙重身份認同的形成，反映了「革命文化」與「非革命文化」的相互碰撞與相互妥協。南下幹部接受「杭州同志」這個身份認同，表明「改造者同樣得到改造」(頁247-51)。

### 三 評價與商榷

綜上所述，本書的研究範式創新，是將傳統的政治史與新興的文化研究相結合。作者選擇杭州接管作為實證研究對象，將論述重點放在南下幹部和杭州市民的文化觀念衝突與趨同方面，的確獨具匠心。書中各章節的敘述，充分展示了單一的政治史框架——特別是中國大陸通行的「黨史」和「革命史」論述框架——所無法涵蓋的豐富內容。通讀全書，我們不難發現中共新政權的政治合法性，一部分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深刻影響，一部分來源於卓越的政治統治能力，一部分來源於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宣傳效果。作者的論述打破了僵硬的歷史分期，展現歷史本身的延續性。正因為本書構思新穎獨特，理論視野開闊，資料豐富多元，論證詳實有力，所以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讚譽。

如果要說本書有何值得商榷之處，筆者印象較深的主要有兩點：其一是作者的有些論述似乎過份誇大了文化觀念因素的實際作用。從前幾章內容看，南下幹部和杭州市民這兩大群體之間的文化觀念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作者的分析論述也是令人信服的。然而談到中共幹部內部(尤其是在中共高層內部)的

政見分歧，強調文化觀念的差異似乎缺乏充分論據。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共中央領導班子核心成員都是延安時期的毛派，他們的早年生活和求學經歷、對中西文化體系的價值判斷、對帝國主義和國內統治階層剝削壓迫的切身感受、對中國革命的路徑選擇和要達成的目標、對黨的一元化領導作用和實行階級專政的看法，等等(或者籠統地稱之為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都是高度一致的。從一個更長時段看，中共歷史上多次黨內重大鬥爭，似乎很難歸結於文化觀念的差異，而是源於對某些具體政策及其政治後果的不同判斷。

其二是本書的許多高見主要基於作者對1950年代初期的實證研究。然而當他最後試圖將論域擴展至文革時期，便進入了一個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他的一些重要論點，其實不過是基於西方學界早期論著作出的主觀推測<sup>⑤</sup>。而這些論著的主要論據，則是毛澤東個人對黨內鬥爭的武斷定性和解釋<sup>⑥</sup>。換言之，本書作者和一些西方學者一樣，都受到毛澤東相關言論的誤導。這集中反映在「結論」部分幾處涉及文革的論斷中，其核心觀點似乎可以歸納為：文革是毛澤東(以及許多政治影響日益增長的「農民幹部」)思想深處「不斷革命」理念的產物，其初衷是要抵制資產階級思想(這裏集中表現為「城市文化」)的侵蝕，保持或恢復共產黨的革命精神(頁249-51)。這樣的認知呼應了作者在〈中文版序〉提到的關於中國革命和法俄革命不同結局的宏大理論思考(頁xxiv)，但顯然有違1950年代中期以後的歷史發展實況。

南下幹部既是「農民革命者」，又是「杭州同志」，雙重身份認同的形成，反映了「革命文化」與「非革命文化」的相互碰撞與相互妥協。南下幹部接受「杭州同志」這個身份認同，表明「改造者同樣得到改造」。



在筆者看來，「文化大革命」其實與「文化」和「革命」無關。歸根結底，這場運動是此前十七年（1949-1966）間各種現實問題疊加的產物，是一場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從精英政治角度分析，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是要打倒持不同意見的劉少奇等人。毛、劉之間的意見分歧並非源於異質文化觀念的衝突，而是源於對大躍進及其失敗的責任問題之不同看法<sup>①</sup>。中共中央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多處提到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問題，實際上認可上述看法。由此可見，將文革定義為「文化革命」或「繼續革命」，其實反映了毛澤東的政治「機會主義」傾向，是一種混淆視聽的輿論宣傳。正因如此，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而是一場持續十年的動亂與浩劫。

### 註釋

①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② 參見林蘊暉、范守信、張弓：《凱歌行進的時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等論著。

③ 參見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等論著。

④ 參見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南京市檔案局編：《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江蘇卷·南京分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吳盛杰、董國強：〈新中國成立初期南京城鄉商業的轉型與重構〉，《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5期，頁111-24。

⑤ 參見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Maurice J.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等論著。

⑥ 在大躍進失敗至文革爆發期間，毛澤東在很多黨內講話和批示中刻意混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將社會各界對一些錯誤政策的不同意見納入「階級鬥爭」的範疇，並宣稱黨內意見分歧其實是社會上階級鬥爭的反映。詳見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1962年8月9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4日）、〈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1963年5月）等重要文獻。參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3）。

⑦ 參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著，何祚康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2）；Andrew G.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董國強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顧荻飛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本科生

徐 堯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本科生